

【研究紀要】

中共政治法規的本質：辯證邏輯與制度化視野

蔡 文 軒

（中央研究院政治所研究員）

摘要

對於中共領導人在權力繼承或幹部管理相關討論中，學者多從制度化的角度來檢視之。本文認為在中共的政治法規，包括黨內法規與國家法律，在涉及幹部選拔或政策決定的相關規定時，其主要的目的是在實踐黨與國家在一定時期的歷史任務，及最高領導人的理念。因此，相對於西方的制度化的理論，中共更慣之引用的是辯證邏輯。由於列寧體制本質的缺陷，使得中共的政治法規很難產生憲政主義的制衡功能。一旦最高領導人的理念出現改變，再加上黨內並不存在與之抗衡的派系，使得原先規範容易被破壞。從這個面向來看，習近平蓄意延續政權的理念，且黨內欠缺足以與習抗衡的派系，使得幹部繼承與管理等相關規範受到習的破壞。

關鍵詞：制度化、辯證邏輯、國家法律、黨內法規

* * *

壹、前言

究竟中共政權有沒有制度化，這或許是近 20 年來，中國政治研究一個最受人矚目的議題之一。學者們注意到，至少從江澤民時期開始，中共高層政治出現了越來越多的規範（Teiwes 2002）。而在 2000 年初，對於中共體制是否將趨向制度化，開始成為學者們辯論的焦點。

制度化可以視為是一套政治秩序或規範能成為共識，並得以穩定持續的過程（Huntington 1968, 12）。在本文的討論中，主要將制度化的討論放置在幹部管理體制等議題。有學者認為在歷經鄧小平、江澤民與胡錦濤時期的運作後，中共已經逐步發展出一套幹部甄補與政治繼承的慣例，使得制度化的現象逐步出現在中國這個列寧體制的國家（寇健文 2013, 43-51; Bo 2004）。但在習近平執政後，破壞了相關的人事管理規範，使得許多親信幹部得以在超齡後，還能夠繼續擔任重要職務（Shirk 2018, 29-30），舉例來說，王岐山以 70 歲高齡接任國家副主席，及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於 69 歲當選政治局委員。

吾人如何解釋這個現象？學者觀察到習近平基於威望所實施的強人統治，使得他打破政治繼承的制度化，來實現個人權力的持續（Kou 2021）。確實，習近平處處模仿毛澤東的風格與政策，並和毛一樣，將自己視為是引領中國走向民族復興的唯一人選。此外，美中之間的競逐，更使得習近平認為只有他才能解決中國在國際上所遇到的挑戰。Joseph Fewsmith（2021, 16-17）則認為中共的列寧式體制，因欠缺權力制衡的機制，因此從來沒有出現過真正的制度化。他認為在 1980 年代以降所出現的一些規範（norms），只不過是派系平衡下的權宜措施，但沒有真正成為黨內精英的集體共識。Fewsmith 用規範的概念來取代制度化，並認為中共政治只有權力平衡的現象，但很難視為達臻制度化的標準。

精英人格與派系政治等因素，似乎可解釋為何歷經江澤民與胡錦濤時期後，中國政治在習近平時期為何出現制度耗散（institutional dissipation）的現象。^①除此之外，是否有其他因素可以解釋為何制度化的進展在習近平時期出現倒退？本文將從政治法規的本質來進行解釋。中國政治的相關成文性法條，可分為黨內法規和國家法律兩類。針對重要的幹部管理或相關政治規範，中共通常是先以黨內法規來制訂，再依據黨內法規的內容來制訂相關的國家法律。

註① 關於對制度耗散的討論，參見寇健文（2013, 80-81）。

政治法規的其本質恐怕不是在限制最高領導人的權力，以黨內法規為例，它是依據黨在該時期的任務與屬性，來進行制訂與修改，其目的在於強化黨與領導人的政治地位，以便推動相關政策。中共在不同時期，制訂出相關黨內的規範，來指導黨務與政務的運作（Smith 2018）。舉例來說，習近平所強調的「從嚴治黨」原則，及由此來制訂或修改的相關黨內規範。諸如在 2015 年與 2018 年所修改的「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強調所謂禁止「拉幫結派、對抗組織審查、搞無原則」，及黨員必須「牢固樹立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這些法規的功能，事實上是有助於習近平透過紀律監察的機制，來強化個人的權威與政策實踐，並整肅異己（Liao and Tsai 2020, 32-33）。如果後習時期的最高領導人，其政治理念不同，很可能相關的黨內法規也會相繼調整，並繼而影響國家法律的修改。換言之，政治法規很難以「制度化」的角度來檢視之，因為它充斥高度的人治色彩與辯證邏輯（dialectical logic）思維，尤以黨內法規更是如此，它強調在一定歷史時期內，法律是為政治所服務。

在中共以黨領政的思維下，國家法律從來不是獨立存在的體系，而是必須服膺於黨內法規與黨的歷史任務來做制訂。中共在習近平時期似乎更強調「法治」、「依法治國」或「依規治黨」等口號（中共中央辦公廳法規局 2022），使黨內法規與國家法律的立法數量，較之胡溫時期，不減反增。但許多國家法律的制訂或修改，是在完善黨內法規所強調的任務。本文將討論中共政治法規的本質，也就是與幹部管理相關的黨內法規或國家法律，來分析在高層的政治繼承是否可能達到制度化之目的。

本文的內容安排如下：第二節，討論學界對於制度化的辯論；第三節討論中共的辯證思維，來論證制度化邏輯可能不太適用於中共體制的發展；第四節討論政治法規的本質與意涵；第五節檢視 2000 年代的法治建設，並說明其的缺失與本質為何；第六節則提出威權政治的法制化，用來說明過去中共制訂法規的目的；第七節從習近平的執政案例來說明他對於高層政治法規的破壞；最後，是本文的結論。

貳、從政治繼承是否制度化的辯論談起

學界對於中共政治繼承是否制度化，曾提出不同的看法。本文認為，這些辯論的背後，反映了學者對於中共政治法規的本質，可能存在互異的觀點。部分學者認為中共的政治繼承有可能走向制度化，其認為中共的政治法規，可能衍生出某種剛

性規範，來對執政者行為產生制約。但持反對意見者，則認為中共的政治法規恐怕是在派系妥協下的產物。一旦這種因素不再存在，例如黨內有集權者消滅了不同的派系，則政治法規的內容也就會改變。簡言之，吾人不應該將中共的政治法規視為獨立存在的產物，它極可能與政治格局的演變有相對應的關係。^②

對於制度化持肯定論的學者，多採用西方文獻定義來討論制度化的規範，特別是對於民主議會的相關研究（寇健文 2013, 70-73; 趙建民 2002, 87-88）。其在觀察議會等機構運作的制度化時，會著重於該機構是否出現了明顯的周界（boundedness）；內部組織的繁複性（internal complexity）；是否可以調適（adaptation）外在環境的挑戰；機構是否存在自主性（autonomy）而可以獨立於其他組織之外；以及「凝結性」（coherence），意即精英間是否對規則出現共識。這方面的論述相當周全，但可以再釐清的是，組織的制度化是否可以完全移植到領導繼承的議題上。畢竟，像是自主性、繁複性等指標，主要是討論機構的發展，而非幹部管理。此外，這類西方文獻主要建立在權力分立與制衡的前提下，但這些指標對於列寧黨國體制是否完全適用，則或可再探究。

持否定論的相關研究，可以 Fewsmith（傅士卓）為代表。他傾向將制度化視為：一、政治體系在決定領導人或幹部晉升時，出現了一套規範，以及二、這套規範可成為精英的共識，使得在不發生政治鬥爭的前提下，將規範順利傳承至下任領導人來遵循，並完成權力交接（Fewsmith 2021, 2）。事實上，這兩個過程類似寇健文所提出的「制度建立」與「制度深化」（寇健文 2013, 6）。在檢視制度化是否獲得實踐，吾人確實必須將重點放在建立與深化的兩個時序過程。

Fewsmith 的定義相當簡潔扼要，在某種程度上，他主要是從「凝結性」的角度，來討論中共精英繼承的規範，是否有可能成為黨內的共識。相較於國內學者從更為全面性的指標來討論，Fewsmith 的問題也在於其對制度化的討論似乎過於簡單。例如，他對繁複性或自主性等範疇並未予以深究，這就無法讓我們理解在不同時期的黨政規範是否出現迥異，而這些規範是否能有效「調適」政治環境的挑戰。誠如 Nathan 的觀點，在習近平時期出現了更多的制度設計與法規修改。從這個面向來說，習時期較之胡錦濤時期，可能更為制度化（Fewsmith and Nathan 2019, 178）。此外，他的討論較少觸及決策制定的議題，但這對於中共政治來說，卻相當重要。最後，Fewsmith 雖然傾向以「規範」來取代制度化，但他似乎並未討論即便是中共的政治規範，也存在不同性質。

註② 以黨內法規為例，其制訂就與中共的領導格局有關。相關討論，參見黃意植（2013）。

本文認為上述的觀點都有其貢獻。我們進一步認為，中共在制訂相關政治繼承或幹部管理的規範時，多是以黨內法規先行，再制訂或修改相關的國家法律。黨內法規是否能以「制度化」的指標來檢視，可能就值得討論。確實，與黨內法規相較之，國家法律或許有更獨立的地位，且涉及的層面更為廣泛，用以調適社會經濟的新挑戰。例如，中國在 2000 年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草案）」，將過去制訂的一些相關民法規範進行彙整與修訂，其目的在於強化社會治理的法治性（中國人大網 2020）。又例如 2021 年制訂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資訊保護法」，對個資的運用與限制，做了更詳細的規定來優化市場運作（中國人大網 2021）。

但與政治權力繼承或幹部管理相關的規範，通常先以黨內法規的形式出現。而黨內法規的性質，主要是根據黨在一定時期的歷史任務與政治需要來制訂。黨內法規具有法律與「政策」（政治）的雙重性質，黨內法規所制訂的政策，是為確保黨的長期執政（殷嘯虎 2016, 14）。這使得黨內法規似乎很難以「制度化」的概念來檢視，它比較像是中共官方思維中的辯證邏輯。

參、中共的辯證思維

中共革命深受蘇聯的影響，其指導思想包括馬列主義等唯物辯證的哲學。雖然有學者認為重要領導人，例如毛澤東思想還受到中國傳統著作的影響（Pang 1964），但這並不影響中共透過辯證思維去做為世界觀，理解革命與執政方向的基礎。辯證思維有兩個基礎：正確認識特定時期的矛盾對象，以及從而去實踐既定之目的。相關內容在毛澤東於 1937 年撰寫的「矛盾論」與「實踐論」可以看出（郭湛 2017）。以中共的黨軍關係為例，在革命戰爭初期，毛澤東、朱德，曾對於軍事領導體制有所爭執。但在 1929 年的古田會議，中共認為為了強化對國民黨的軍事鬥爭，必須確立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從而奠基了中共黨軍關係的型態。迄今，「槍桿子出政權」的理念，仍被中共認為是達到政權穩固的保證（Yu 2000）。

在辯證邏輯強調透過正命題（thesis）與反命題（antithesis）之間的爭辯（struggle），進而發展出一個新命題（new thesis）。而這個新命題將衍生出另一個反命題，進而推導出另一個新的命題，這也就是所謂的辯證過程（dialectical process）（Baradat 2017, 181-183）。一旦歷史情境與政治需要改變，政策也就會做出改變，朝向下一個「命題」來前進。

中共對於法制政策的推動就是一個辯證過程。在 1950 年代，時任北京市委書記的彭真主抓法制建設工作，要求全國各階級民衆按照法律規章來辦事，以強化社會的整體治理。但毛澤東爲首的中央領導，在部分政治活動仍憑藉群眾運動等方式來打擊所謂「反革命」或「右派」，例如 1955 年開始發動的胡風案與「肅清反革命」運動，毛澤東往往透過群眾運動的方式未審先判來羅織罪名，逐漸對法制建設造成負面衝擊（鍾延麟 2022）。這種辯證過程到了文革，更是幾乎完全揚棄法制的概念，而是以群眾運動的方式來治國。一直到改革開放後，中共又重新強調法制，但中共仍強調一黨專政的原則，例如在 1999 年通過的《憲法》修正案，明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郭祥瑞 2016, 58）。」而從江澤民開始引領的司法改革，也往往可以見到黨的領導在此過程的重要性（陳至潔 2010）。

又以中共在推動基層治理爲例，毛與鄧時期的基層幹部選任傾向於黨委直接決定，以實踐黨管幹部的原則。但這種作法讓幹部在民間的公信力或本身能力，可能有所不足，因此在江澤民與胡錦濤時期出現了有限度的選舉或競爭性選拔，意即有限度活化的幹部甄補的過程（張佑宗、吳振嘉 2011; 張執中、王占璽、王瑞婷 2013; 黃信豪 2010），望藉以強化基層幹部的能力，但選舉制度有可能弱化黨在基層的領導。習近平對於權力鞏固的追求要更高於幹部選任制度的改革，因此在習近平時期的中國，基層幾乎已經揚棄了競爭性選舉制度的推行，以確保黨對國家與社會的全面控制。

從以上的例子可探知，中共的辯證思維用在執政，其主要目的在於確保政權的存續。共黨中國的法規或制度，並沒有真正的獨立性與權力限縮等功能。換言之，中共的辯證邏輯很難將制度化的概念應用在政治體制的發展，取而代之的，是中共的相關規範呈現出威權法制（authoritarian legality）或法制威權主義（legislating authoritarianism）的特色，也就是法規建設的目的僅在於強化政權的統治能力，而無法因此而衍生出民主改革的進程（Chen and Fu 2020, 2; Wang and Shi 2022）。

此外，許多學者提到，中共的改革其目的並不在於和市民社會分享權力，以及實踐真正的民主化。相反的，改革是爲了強化執政能力與合法性，以確保政權的永續（Shambaugh 2008; Pei 2006）。中共在不同時期提出的各種路線，諸如鄧小平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江澤民的三個代表，以及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都是爲了適應不同時期的挑戰而提出的方針（Pang 2016 108-109）。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共制訂政治法規之目的，可能是爲了達成由黨所設定，在一定時期的歷史任務，而非是走向限制權力的方向。

肆、政治法規的本質

基於辯證思維的引導下，中共認知的法律體系跟西方有很大的不同。在一黨專政的本質下，當代中國的法律並沒有限制執政者權力的理念，中國學者強世功稱為「黨國憲政主義」（Party-State Constitutionalism）（Jiang 2014）。此外，中共體制出現雙元的法律系統，包括黨內法規與國家法律。其在幹部管理的領域亦有這雙元的架構，這些規範即本文所謂的政治法規。

黨內法規主要是由各級黨委的「黨的建設工作委員會」來負責主導。^③在具體的制訂上，由省級（直轄市）以上黨組織負責，這包括黨的中央組織以及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中央各部門，和省、自治區、直轄市的黨委。其次，黨內法規有特殊的名稱，包括：黨章、準則、條例、規定、辦法、規則、細則（共產黨員網 2019）。至 2021 年 7 月 1 日，黨內法規共 3615 部。其中，黨章 1 部，準則 3 部，條例 43 部，規定 850 部，辦法 2034 部，規則 75 部，細則 609 部（澎湃 2021）。

國家法律由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來主抓。當然，人大在制訂重要的國家法律時，通常會依據黨委的指示來進行相關工作。而國家法律的內容，不能抵觸黨內法規，且立法機關的黨組，必須依據黨的路線、黨內文件與決定來立法。誠如中共在 2014 年下發的文件指出：社會主義法治必須堅持黨的領導，黨的領導必須依靠社會主義法治（中國政府網 2014）。

此外，兩者對於違法者的懲處方式不同。國家法律主要是罰款、徒刑，以及死刑。而黨內法規主要是針對黨員的政治身分，來進行相關懲處，其包括警告、嚴重警告、撤銷黨內職務、留黨察看，和開除黨籍五種（人民網 2018）。黨內法規與國家法律必須相互協調，由前者來主導後者。例如，一旦幹部被黨內法規處以開除黨籍，國家法律的刑度通常是無期徒刑、死刑或死緩。中共內部稱此原則為「政治目的與依法定罪相統一」（Liao and Tsai 2020, 35）。

就歷史的發展來說，中共先有黨內法規，後有國家法律，因此前者在政治領域的重要性可能較高。黨內法規的性質，是依據黨的綱領、路線，與方針，^④來制訂、變更，以及廢除，這體現了典型的辯證思維。這些黨的綱領、路線或方針，主要是依據一定時期內，黨的歷史任務或最高領導人的政治需求來做規劃，並用以強

註③ 作者訪談，廣東中山大學學者，2022 年 1 月 12 日。

註④ 對於這些詞彙的相關討論，參見景杉（1991, 81）。

化黨與領導人的執政地位。甚且，領導人在文件上的批示，可以透過正式程序來成為正式的黨內法規或國家法律，^⑤ 這體現了人治思維對法規制訂的影響。

中共最早出現黨內法規的概念，是在 1938 年。當時，毛澤東在黨內的地位已經日趨穩固，他提出「四個服從」的概念——也就是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以及全黨服從中央——並依據上述理念來制訂黨內法規。毛透過黨內法規的制定，讓全黨幹部服從他的指示，並在 1945 年正式成為黨內的最高領導人（宋功德、張文顯 2020, 13-14）。

黨內法規也可以依據領導人的政治需要而做出改變。在 1949 年，毛澤東希望強化統戰工作，並宣示中共將容納更多的黨派與社會團體來共同治理中國。基於這個政治需要，中共在 1949 年 3 月頒布了關於「反對個人崇拜」的黨內法規，禁止以領導人的名字來做為地名或街名，也不能過於強調「毛澤東思想」這個概念。但後來因為毛澤東要推動大躍進的政策，因此開始強調個人集權的重要性。在 1958 年的政治局會議，毛澤東提出要有正確的個人崇拜，也就是要對領袖的正確路線，給予支持與崇拜（馮建輝 1999, 37-38）。中共將這些黨內決議，以文件的方式來發給幹部周知。由此可知，黨內法規的本質，就是依據領導人的政治需要來制訂與更改。

黨內法規的內容，也會影響國家法律的制定。一個顯著的例子，是中共在 1969 年召開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全面肯定文化大革命的貢獻。此外，在會議中修改了中共黨章，強調要推動「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為了銜接這些黨內法規，中共在 1975 更改了憲法的部分內容，全面廢除各種形式的選舉制度，取而代之的，是由各層級的革命委員會來指派幹部擔任某個職務。這種作法是為強化文革派能充分掌握黨政機關的人事任命。由此可以看出，黨內法規一旦更動，相關的國家法律也往往會進行調整。

在黨國憲政主義下，中共法律體系並沒有對政治權力的制衡功能。黨內法規做為實現領導人政治理念的一個工具，其設置與異動也隨時必須依據當時的政治需要來進行。此外，黨內法規的內容，往往指導國家法律的制訂。這使得無論黨內法規或國家法律的內容與運作，都必須依循最高領導人的意志，並受其控制。

註⑤ 關於中共的批示制度與運作，參見 Tsai (2015)。

伍、重新檢視2000年代的制度建設

如前所述，若中共的制度化現象，只是在派系平衡因素下的一個「假象」，則學界過去對中共政治繼承邁向制度化的觀點，可能就值得再商榷。許多觀察家的心中，2000年代正是中共實踐「開明專制」的一種體現，甚至可能開啓中國民主化的機會之窗（余杰 2017）。在當時，社會出現一定程度的自由化，且中共也進行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政治改革。其中，包括對黨委書記的權力限制，這也就是中共稱之的黨內民主（He 2006, 192-195）。但若依據 Fewsmith 的觀點，該時期是因胡錦濤與江澤民的派系之間，出現了某種權力平衡的關係，因此讓一些規範能順利出臺，避免某個派系的坐大。江澤民與胡溫時期，中共對幹部任期、選拔方式與標準，及決策的過程，確實都出現更細膩的規定（寇健文 2013, 272-273, 324-325）。

但較少有人注意到，這些規範多先以黨內法規的形式呈現，再制訂出相關的國家法律。以中共在 2002 年制訂的「黨政領導幹部任用選拔條例」為例，就是極重要的黨內法規。該條例對於幹部的甄補方式做了更詳細的規範。爲了面對 2000 年之後，中國面對經濟與社會的更險峻問題，中共確實需要有才能的幹部來擔任領導職，以確保政權的存續。在 2002 年版本，該條例強調的是幹部要做滿一定的任期才能調動或升遷。但習近平時期，由於地方矛盾的加劇，中共希望能儘速選拔一批有能力的年輕幹部擔任地方領導職，例如透過選調生的制度來安排年富力強的幹部擔任縣級領導（Tsai and Liao 2022）。因此在 2014 年與 2019 年對於「黨政領導幹部任用選拔條例」進行修改。強調表現良好的基層幹部可以不受任期制的規定，給予迅速提拔，甚至越級提拔（Kou and Tsai 2021, 6-7）。這再度顯示黨內法規確實可以依據領導人的意志，來隨時做修改。

除了「黨政領導幹部任用選拔條例」，中共在 2000 年代還頒布許多關於決策與人事管理的規範，但幾乎多先以黨內法規的形式出現（寇健文 2013, 325）。這些規範的建立，有助於中共在 2000 年代所推動的黨內民主，以甄補優秀幹部擔任重要職務，強化中國的經濟發展與現代化建設。此外，透過黨內民主的機制，也可以對黨委書記進行有限度的權力制約，避免出現過於獨裁專斷的情形。而黨內民主的制度與氛圍，似乎影響到高層政治。江澤民將權力和平交接給胡錦濤，胡錦濤再將權力交接給習近平，完成黨與政府領導人的兩次輪替，這在威權國家當中是罕見的例子。

在這個執政理念下，政治法規的內容，確實對於幹部甄補與決策過程，做了較

有實用性的規範。但無論是江澤民或胡錦濤，根本無意推動西方式的民主制度，也不允許有任何社會力量與中共分享權力，黨內民主只是中共用以實踐國家發展與政權存續的工具。在江與胡時期，中共黨內出現的一些制度規範，是環繞在最高領導人的國家發展戰略下來制訂。一旦領導人的理念發生改變，且權力能壓倒其他派系時，會使得政治格局不再需要權力平衡的考量。這使得政治法規，包括黨內法規與國家法律，將依據新任領導的需要而異動，並破壞原本的制度規範。

陸、威權統治的法制化

習近平時期，中共大規模進行制度建設，包括制訂黨內法規與國家法律。以黨內法規為例，在習時期的制定數目要遠高於過去任何一位中共領導人（宋功德、張文顯 2020, 105-112），但這似乎不能說明這些法規對於習的權力造成實質性的制約。爲了強化黨內法規與國家法律的銜接，習近平成立了「中共中央全面依法治國領導小組」，並由習近平擔任組長。習時期的中國立法數目雖多，但多聚焦於習近平的執政理念來制訂。換言之，這種法治建設雖然很難視爲是一種法治（rule of law）的理念，但卻是典型的法制（rule by law）思維，或所謂「有中國特色的法治」（rule of law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這些法律或制度建設，有非常強的供給面（demand-side）需求（Wang 2015, 4-7），其目的是爲中共政權存續所服務。中共更在 2020 年 11 月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工作會議，提出了「習近平法治思想」的概念。用中共的術語來說，這個詞彙象徵著領導人執政理念與「法治」建設的「有機統一」。

習近平透過黨內法規和國家法律的「頂層設計」，讓所有的施政都有法律可以依循。中共特別重視黨內法規的建設，在 2014 年，中共宣稱要「形成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並主張「黨內法規既是管黨治黨的重要依據，也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有力保障」（中國人大網 2015）。在官方的鼓勵下，中國社會科學界也針對黨內法規與國家法律的銜接與協調，做了討論（付子堂 2016）。習對於黨內法規與國家法律的建設，可視爲是威權主義的法制化，也就是獨裁者在進行任何施政，包括對人權的迫害時，都可以宣稱其是依據法律的規範來進行。在威權國家當中，積極的進行立法的行爲，並不能視爲是一種對民主化的推動。它反而可能是一種更爲集權的獨裁模式，並讓所有司法機構，能爲獨裁者的需求來服務。

習近平時期對於國家監察體制的改革，恰好說明了威權主義法制化的現象。中

共在 2016 年開始在地方先試行新的監察體制，在 2018 年，中共整併政府的相關監察與調查部門，而組建了國家監察委員會，該機構與中共的紀律檢查委員會一起合署辦公（Li and Wang 2019）。爲了組建國監委，並與紀委合署辦公，中共在 2021 年修改了「中國共產黨紀律檢查委員會工作條例」，在第七條規定「黨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與國家監察委員會合署辦公，黨的地方各級紀律檢查委員會與地方各級監察委員會合署辦公，實行一套工作機構、兩個機關名稱，履行黨的紀律檢查和國家監察兩項職責」（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 2022）。這項規定使得紀律檢查委員會，原本只能針對黨員來進行辦案，但現今卻能將辦案對象擴至非黨員。這對於更多數的公務員有了更強的鎮懾功能（中國人大網 2018），^⑥使之更不敢反對習近平的政策。

此外，習近平強調「制度治黨」。他在 2021 年底的全國黨內法規工作會議，指出要「發揮好黨內法規在維護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保障黨長期執政和國家長治久安方面的重大作用」。在習上臺後，他透過黨內的反腐敗鬥爭，來打擊江澤民的派系，並擴大自己的政治勢力（Yuen, 2014）。在這個過程中，中共出臺了許多關於反腐敗的黨內法規，並加大國家法律對於腐敗行爲的刑度。例如，在 2015 年對刑法進行修正，增大了貪污罪和受賄罪的定罪量刑標準，不再以具體數額作爲量刑標準，而是將犯罪的情節作爲定罪量刑標準。此外，也規定利用國家工作人員的影響力，來謀取不正當利益的定罪細節（環球網 2015）。透過這一系列的安排，習近平把反腐敗、法治建設、政治鬥爭，以及強化個人權力，做了巧妙的連結。

習近平執政後，強調「黨的全面領導」。無論是監察體制改革或反腐鬥爭，他都將其理念進行實踐，並藉此強化其政治地位。更弔詭的是，這些措施都是依據法律來進行，但我們似乎看不到法律對於最高領導人的權力限制。無可諱言的，中國在習時期的威權主義法制化，強化北京對政治與社會的控制與監督，讓官員與民衆都承受於來自黨中央的強大壓力。

柒、對高層政治體制的破壞

習近平執政所造成的另一個負面影響，在於其對於高層體制的破壞。中共在歷

註⑥ 這裡所指的公務員，主要是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第 16 條規定的範疇，包括綜合管理類、專業技術類和行政執法類等類別，這些公務員並不一定有中共黨籍。

經鄧小平、江澤民，與胡錦濤時期的運作後，高層政治在幹部選用或決策上，都出現了一些規範。但如前所述，這些規定的成文部分，幾乎是以黨內法規的形式來呈現。這注定了這些高層政治的規範，其本質有相當大的不確定性。

中共在 2018 年透過修憲，廢除國家主席的兩任限制，這使得習近平可以無限次數的擔任這個國家最高領導職。中共黨內法規對於總書記和軍委主席，都沒有任職期限規定。在廢除國家主席的任期制後，習近平將可以在 2022 年底的中共 20 大，繼續擔任上述三個職務，而集中了黨、政，和軍事的權力。

中共歷次黨章的規定中，都沒有對於最高領導人的任期有做出限制。在 1945 年的七大黨章，強調全黨必須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綱領，這建立了毛終身執政的基礎。而 1969 的九大，甚至將林彪作為「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列入黨章，顯見黨章是最高領導人用來強化政治權勢的工具。之後的幾次黨章修訂，雖然觸及到政治或經濟上的改革，但始終沒有對最高領導人的任期有任何規範（共產黨員網 2022）。在 1980 年代後，中共歷經三次政權的和平交替，但從黨內法規內容來看，其似乎並沒有明確的條文反對最高領導人永久執政。

此外，習近平時期打破常規的決策體制，將重要議題交由許多新成立的領導小組來負責，弱化政治局及其常委會的權力（Tsai and Zhou 2019, 20）。中共在 2018 年之後，組建的幾個委員會，例如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委員會、中央財經委員會、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由習近平擔任委員會主任，而負責日常工作的委員會辦公室主任多由習的親信擔任（蔡文軒 2022, 118-121）。這種「委員會（小組）治國」模式，強化了習近平在重要決策領域上的主導權（李文輝 2019）。而架空政治局常委會的結果，恐將使得胡錦濤時期建立的常委負責和「個人分工」體制，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壞。

在習近平時期，中共積極強化對習近平的個人崇拜，許多黨內法規將「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習思想）與「兩個維護」寫進內容。「兩個維護」指的堅決維護習近平總書記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以及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例如在 2020 年公布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工作條例」就提到要堅持「習思想」與「兩個維護」（中央紀委國家監委駐應急管理部紀檢監察組 2020）。這種將政治權力高度集中於一人的體制，可能帶有強大的行政效率，但也是極為脆弱的體制，對於常態化的制度建立，可能造成斷喪。

在列寧體制的架構下，中共的政治法規並沒有實質的權力制衡功能。這使得一旦具有政治野心的最高領導人執政，將無可避免地出現破壞規範的現象。習近平個人的人格特質，具有強烈的決心與歷史使命感，某種程度上可視為「開創性的領導

人」(creative leadership) (Tucker 1977)。習身為紅二代的背景、文革時期的經歷，與之後的從政與鬥爭經驗，都使他對於權力有迫切的渴望，並認為其有能力可以帶領中國走向現代化 (Torigian 2018; Lee 2018)。一旦習近平有延續政權的想法，且黨內欠缺足以與之抗衡的政治派系，中共體制很難有足夠機制可以去對於習的野心做出制衡。

捌、結論

為何中共在習近平時期會出現制度化倒退的現象？本文嘗試從政治法規的本質去解釋。在 1980 年代後，中共確實出現許多關於幹部選拔或政策決定的規範，多先以黨內法規的形式來呈現，再制訂出相關的國家法律。這些政治規範的功能，主要是在一定歷史時期內，強化領導人理念並鞏固黨的統治。因此，政治法規如何制訂與修改，存在很強的辯證思維，恐怕不太適合用制度化的分析框架來檢視。

中國的法規在未涉及到高層政治權力分配或繼承等重大議題時，似乎還是有制度化的現象。舉例來說，在市場經濟與個人資產意識逐漸昂頭的現今，中國政府日漸重視對人民財產權與相關權利的保障，在 2017 年公布「民法總則」，而在 2020 年制訂「民法典」(Herbots 2021)。但若涉及到高層政治權力分配等重大領域的法規，可能難以用制度化邏輯來檢視之，取而代之的是辯證過程的思維。

習近平透過強化政治法規的建設，將其執政理念進一步貫穿到黨內法規與國家法律的層面，實踐了威權主義的法制化。在以「非正式的個人權威」為權力來源為主的領導人(寇健文 2013, 85-86)例如習近平，其往往能夠輕易的破壞既有規範與制度。相較於習近平，欠缺個人威望的胡錦濤，就無顯著的能力可以破壞既有制度或規範。

雖然中國在習時期的法規數量眾多，遠高於江、胡時期，但這並不能說明習的權力有受到任何實質的限制。相反的，這種威權主義的法制化，讓習近平的所有政策，都有法規來背書。在 2023 年召開的 20 屆 2 中全會，審議的新一輪機構改革，可能涉及到黨對於政府的全面領導，藉由從法制層面來進一步強化習近平對於全中國的領導(中央廣播電臺 2023)。簡言之，習時期中共的專制與集權化程度，高於胡時期。在習近平蓄意延續政權的理念下，黨內欠缺足以抗衡的派系，使得相關黨內法規或國家法律，都無法遏止習膨脹的野心。最後，一旦中國的政治發展邁向後習時期，這套建立在習近平個人威望基礎的制度建設，是否能延續到後任繼承

者？亦或者，中國的政治體制出現了衰敗與不穩定，這都值得做後續的觀察與研究。

* * *

（收件：111 年 9 月 30 日，接受：112 年 2 月 13 日）

【Research Note】

The Essence of Political Regulation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Dialectical Logic and Institutionalized Perspective

Wen-hsuan Tsai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Academia Sinica (Taiwan)

Abstract

Scholars have mostly examined the discussion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leaders' power succession or cadre management from an institutionalized perspective.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main purpose for the political regulations of the CCP, including party regulations and national laws, when it comes to the selection of cadres or policy decisions, is to fulfill the historical tasks of the party and the country in a certain period of time, and to practice the idea of supreme leadership. Therefore, compared with Western institutionalized theories, the CCP is more accustomed to citing dialectical logic. Due to the inherent defects of Lenin's system, it is difficult for the CCP's political regulations to produce the check and balance function of constitutionalism. Once the idea of the top leader changes, coupled with the fact that there are no factions in the party to contend with it, the original norms are easily destroyed.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Xi Jinping deliberately perpetuates the ideals of the regime, and the lack of factions within the party capable of competing with Xi Jinping has caused Xi to undermine relevant norms such as cadre succession and management.

Keywords: Institutionalization, Dialectical Logic, National laws, Party Regulations

參考文獻

- 人民網，2018，〈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http://cpc.people.com.cn/BIG5/n1/2018/0827/c64094-30251913.html>，查閱時間：2021/10/21。people.cn. 2018. “Zhongguo gongchandan gjilu chufen tiaoli” [Regulation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n Disciplinary Actions]. (Accessed on October 21, 2021).
- 中央紀委國家監委駐應急管理部紀檢監察組，2020，〈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工作條例〉，https://www.mem.gov.cn/jjz/zcfg/202103/t20210305_380984.shtml，查閱時間：2022/12/16。Zhongyan gjiwei guojia jianwei zhuyingji guanlibu jijian jianchazu. 2020. “Zhongguo gongchandang zhongyang weiyuanhui gongzuo tiaoli” [Working Regulations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ccessed on December 16, 2022).
- 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2022，〈中共中央印發「中國共產黨紀律檢查委員會工作條例」〉，https://www.ccdi.gov.cn/toutiao/202201/t20220104_162161.html，查閱時間：2022/07/06。Zhongyang jilu jiancha weiyuanhui. 2022. “Zhonggong zhongyang yinfu ‘zhongguo gongchandang jilu jiancha weiyuanhui gongzuo tiaoli’”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sued the “Regulations on the Work of the Disciplinary Inspection Commiss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ccessed on July 06, 2022).
- 中央廣播電臺，2023，〈中共黨國機構改革方案，學者：貫徹集中領導〉，<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2160671>，查閱時間：2023/03/02。China National Radio. 2023. “Zhonggong dangguo jigou gaige fangan, xuezhe: guanche jizhong lingdao” [The Reform Plan of the Party-State Organiza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cholars: Implementing Centralized Leadership]. (Accessed on March 02, 2023).
- 中共中央辦公廳法規局，2022，〈充分發揮依規治黨的政治保障作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加強黨內法規制度建設紀實〉，<http://cpc.people.com.cn/BIG5/n1/2022/0626/c64387-32456719.html>，查閱時間：2022/07/04。Zhonggong zhongyang bangongting faguiju. 2022. “Chongfen fahui yigui zhidang de zhengzhi baozhang zuoyong: yi xijinning tongzhi wei hexin de dangzhongyan gjiaqiang dangnei fagui zhidu jianshe jishi”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Political Guarantee in Governing the Party According to the Rules: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with Comrade Xi Jinping as the Core Strengthens the Construction of Intra-Party Laws and Regulations]. (Accessed on July 04, 2022).

- 中國人大網，2015，〈把經濟社會發展納入法治軌道〉，http://www.npc.gov.cn/zgrdw/npc/zgrdzz/2015-12/17/content_1954861.htm，查閱時間：2022/07/05。Zhongguo renda wang. 2015. “Ba jingji shehui fazhan naru fazhi guidao” [Incorporat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to the Track of the Rule of Law]. (Accessed on July 05, 2022).
- 中國人大網，2018，〈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http://www.npc.gov.cn/zgrdw/npc/lfzt/rlyw/2018-12/29/content_2071578.htm，查閱時間：2022/12/16。Zhongguo renda wang. 2018.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gongwuyuanfa” [Civil Service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ccessed on December 16, 2022).
- 中國人大網，2020，〈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草案）」的說明〉，<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2005/50c0b507ad32464aba87c2ea65bea00d.shtml>，查閱時間：2022/07/06。Zhongguo renda wang. 2020. “Guanyu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minfadian (caoan)’ de shuoming” [Explanation on “Civil Cod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raft)”]. (Accessed on July 06, 2022).
- 中國人大網，2021，〈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資訊保護法〉，<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2108/a8c4e3672c74491a80b53a172bb753fe.shtml>，查閱時間：2022/07/06。Zhongguo renda wang. 2021.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geren zixun baohufa”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ccessed on July 06, 2022).
- 中國政府網，2014，〈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http://www.gov.cn/zhengce/2014-10/28/content_2771946.htm，查閱時間：2022/12/16。Zhongguo zhengfu wang. 2014. “Zhonggong zhongyang guanyu quanmian tuijin yifa zhiguo ruogan zhongda wenti di jueding” [Decision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n Several Major Issues Concerning Comprehensively Advancing the Rule of Law]. (Accessed on December 16, 2022).
- 付子堂，2016，〈黨內法規與國家法律的銜接與協調〉，http://www.cssn.cn/mkszy/rd/201612/t20161228_3362298.shtml?collcc=4071593220，查閱時間：2022/07/05。Fu, Zi-tang. 2016. “Dangnei fagui yu guojia falu de xianjie yu xietiao” [Coordination and Coordination of Inner-Party Regulations and State Laws]. (Accessed on July 05, 2022).
- 共產黨員網，2019，〈中國共產黨黨內法規制定條例〉，<https://www.12371.cn/2019/09/15/ARTI1568543019644723.shtml>，查閱時間：2021/10/20。Gongchan dangyuan wang. 2019. “Zhongguo gongchandang dangnei fagui zhiding tiaoli” [Regulations on Intra-Party Regulation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ccessed on

October 20, 2021).

共產黨員網，2022，〈黨章歷次修訂概覽〉，<http://www.12371.cn/special/dzxd/>，查閱時間：2022/05/27。Gongchan dangyuan wang. 2022. “Dangzhang lici xiuding gailan” [Overview of Previous Revisions of the Party Constitution]. (Accessed on May 27, 2022).

余杰，2017，〈劉曉波從未幻想中共主動政改〉，<https://newtalk.tw/news/view/2017-07-11/91904>，查閱時間：2022/07/06。Yu, Jie. 2017. “Liuxiaobo congwei huanxiang zhonggong zhudong zhenggai” [Liu Xiaobo Never Imagined That the CCP Took the Initiative to Reform the Political System]. (Accessed on July 06, 2022).

宋功德、張文顯（編），2020，《黨內法規學》，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Song, Gongde, and Wen-xian Zhang, eds. 2020. *Dangnei faguixue* [Inner Party Law].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李文輝，2019，〈小組治國：確立黨中央決策角色〉，<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90803000114-260301?chdtv>，搜尋時間：2022/09/30。Li, Wen-hui. 2019. “Xiaozu zhiguo: queli dangzhongyang juece juece” [Group Governance: Establishing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s Decision-Making Role]. (Accessed on September 30, 2022).

殷嘯虎（編），2016，《中國共產黨黨內法規通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Yin, Xiao-hu, ed. 2016. *Zhongguo gongchandang dangnei fagui tonglun* [A General Discussion on Intra-Party Regulation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寇健文，2013，《中共菁英政治的演變：制度化與權力轉移1978~2010》，臺北：五南出版社。Kou, Chien-wen. 2013. *Zhonggong jingying zhengzhi de yanbian: zhiduhua yu quanli zhuan yi 1978~2010* [The Evolution of the CCP's Elite Politics: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Power Transfer 1978~2010]. Taipei: Wu-Nan Book.

張佑宗、吳振嘉，2011，〈中國大陸基層民主與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臺灣政治學刊》，15（2）：177-232。Zhang, You-zong, and Zhen-jia Wu. 2011. “Zhongguo dalu jiceng minzhu yu nongcun shehui baozhang zhidu de fazhan” [Grassroots Democrac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Social Security System in Mainland China]. *The Taiwa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5 (2): 177-232.

張執中、王占璽、王瑞婷，2013，〈從「直選」到「推選」：中國大陸基層選舉發展的制度邏輯〉，《政治學報》，1（1）：22-30。Zhang, Zhi-zhong, Zhan-xi Wang, and Rui-ting Wang. 2013. “Cong ‘zhixuan’ dao ‘tuixuan’: zhongguo dalu jiceng xuanju fazhan de zhidu luoji” [From “Direct Election” to “Selected Election”: The Institutional Logic of

- Grassroots Election Development in Mainland China].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 (1): 22-30.
- 郭祥瑞，2016，〈從近代「法治國」理念反瞻中國大陸「依法治國」藍圖〉，《展望與探索》，14（11）：47-70。Guo, Xiang-rui. 2016. "Cong jindai 'fazhiguo' linian fanzhan zhongguo dalu 'yifa zhiguo' lantu" [Reflecting on the Blueprint of "Ruling the Country by Law" in Mainland China from the Modern Concept of "Ruling the Country by Law"]. *Prospect & Exploration*, 14 (11): 47-70.
- 郭湛，2017，〈「實踐論」「矛盾論」與百年中國歷程〉，<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n1/2017/1009/c40531-29575090.html>，查閱時間：2022/09/30。Guo, zhan. 2017. " 'Shijian lun' 'Maodun lun' yu bainian zhongguo licheng " ["Theory of Practice" and "Theory of Contradiction" and the History of China in the Hundred Years]. (Accessed on September 30, 2022).
- 陳至潔，2010，〈重鑄紅色天平：中國司法改革的政治邏輯及其對法治的影響〉，《政治科學論叢》，45：67-106。Chen, Zhi-jie. 2010. "Zhongzhu hongse tianping: zhongguo sifa gaige de zhengzhi luoji jiqi dui fazhi de yingxiang" [Recasting the Red Scale: The Political Logic of Judicial Reform in China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Rule of Law]. *Taiw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5: 67-106.
- 景杉（編），1991，《中國共產黨大辭典》，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Jing, Shan, ed. 1991. *Zhongguo gongchandang dacidian*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Dictionary]. Beijing: China International Radio Press.
- 馮建輝，1999，〈關於個人崇拜的歷史反思〉，《炎黃春秋》，（7）：34-40。Feng, Jian-hui. 1999. "Guanyu geren chongbai di lishi fansi" [Historical Reflection on the Cult of Personality]. *Yanhuang chunqiu*, (7): 24-40.
- 黃信豪，2010，〈有限活化的中共菁英循環：黨政領導菁英組成的跨時考察〉，《中國大陸研究》，53（4）：1-33。Huang, Xin-hao. 2010. "Youxian huohua de zhonggong jingying xunhuan: dangzheng lingdao jingying zucheng de kuashi kaocha" [Limited Activation of the CCP's Elite Circle: A Transtemporal Investigation of the Party and Government Leaders' Elite Formation]. *Mainland China Studies*, 53 (4): 1-33.
- 黃意植，2013，〈領導格局轉換下的成文規則演變：以1978年至2006年中共黨內幹部管理法規為例〉，《中國大陸研究》，56（2）：31-44。Huang, Yi-zhi. 2013. "Lingdao geju zhuanhuan xia de chengwen guize yanbian: yi 1978 nian zhi 2006 nian zhonggong dangnei ganbu guanli fagui weili" [The Evolution of Written Rules under the

- Transformation of Leadership Structure: A Case Study of the CCP's Inner-Party Cadre Management Regulations from 1978 to 2006]. *Mainland China Studies*, 56 (2): 34-44.
- 趙建民，2002，〈中共黨國體制下立法機關的制度化〉，《中國大陸研究》，45（5）：87-112。Zhao, Jian-min. 2002. "Zhonggong dangguo tizhi xia lifa jiguan de zhiduhua"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Legislature under the Party-State System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Mainland China Studies*, 45 (5): 87-112.
- 澎湃，2021，〈中國共產黨黨內法規體系〉，https://m.thepaper.cn/baijiahao_13897360，查閱時間：2021/10/19。Peng pai. 2021. "Zhongguo gongchandang dangnei fagui tixi"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Intra-Party Legal System]. (Accessed on October 19, 2021).
- 蔡文軒，2022，〈「黨政融合」與習近平中國的集權化領導〉，吳玉山、寇健文、王信賢主編，《一個人或一個時代：習近平執政十週年的檢視》：105-126，臺北：五南出版社。Tsai, Wen-xuan. 2022. "Dangzheng ronghe yu xijinping zhongguo de jiquanhua lingdao" ["Party-Government Fusion" and Xi Jinping's Centralized Leadership in China]. In Wu, Yu-shan, Chien-wen Kou, and Xin-xian Wang, eds., *"Yige ren huo yige shidai: xijinping zhizheng shizhounian de jianshi"* [A Person or an Era: Examining Xi Jinping's 10th Anniversary], pp. 105-126. Taipei: Wu-Nan Book.
- 環球網，2015，〈加大反腐敗國家立法，刑法修正案草案四方面完善〉，<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9CaKrnJICLX>，查閱時間：2022/07/05。Huanqiu wang. 2015. "Jiada fanfubai guojia lifa, xingfa xiuzhengan caoan sifangmian wanshan" [Increase National Anti-Corruption Legislation, Improve the Draft Criminal Law Amendment in Four Aspects]. (Accessed on July 05, 2022).
- 鍾延麟，2022，〈彭真在1955年中共「肅反」運動中的角色與活動〉，《中國大陸研究》，65（3）：1-32。Chung Yan-lin. 2022. "Pengzhen zai 1955 nian zhonggong 'sufan' yundong zhong di jueuse yu huodong" [Peng Zhen's Role and Activities in the 1955 CCP's "Eradication of Counter-Revolutionaries"]. *Mainland China Studies*, 65 (3): 1-32.
- Baradat, Leon P. 2017. *Political Ideologies: Their Origins and Impact*. New York, NY: Routledge.
- Bo, Zhiyue. 2004.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Elite Management in China." In Barry J. Naughton and Dali L. Yang, eds., *Holding China Together: Diversity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 in the Post-Deng Era*, pp.70-10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hen, Weitseng, and Hualing Fu. 2020. "Introduction: Authoritarian Legality, the Rule of Law,

- and Democracy.” In Weitseng Chen and Hualing Fu, eds., *Authoritarian Legality in Asia: Formation, Development and Transition*, pp.1-13.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ewsmith, Joseph, and Andrew J. Nathan. 2019.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Revisited: Joseph Fewsmith with Response from Andrew J. Natha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8 (116): 167-179.
- Fewsmith, Joseph. 2021. *Rethinking Chinese Politics*.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e, Baogang. 2006. “Intra-Party Democracy.” In Kjeld E. Brodsgaard and Zheng Yongnian, ed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Reform*, pp. 192-209. New York, NY: Routledge.
- Herbots, Jacques Henri. 2021. “The Chinese New Civil Code and the Law of Contract.” *China-EU Law Journal*, 7: 39-49.
- Huntington, Samuel P. 1968.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Jiang, Shigong. 2014. “Chinese-Style Constitutionalism: On Backer’s Chinese Party-State Constitutionalism.” *Modern China*, 40 (2): 133-167.
- Kou, Chien-wen, and Wen-Hsuan Tsai. 2021. “The Dual Elite Recruitment Logic and Political Manipulation under Xi Jinping.” *Issues & Studies*, 57 (4): 1-20.
- Kou, Chien-wen. 2021. “The Reshaping of the Chinese Party-state under Xi Jinping’s Rule: A Strong State Led by a Political Strongma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hinese Council of Advanced Policy Studies, Taipei.
- Lee, Tony C. 2018. “Can Xi Jinping Be the Next Mao Zedong? Using the Big Five Model to Study Political Leadership.”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23: 473-497.
- Li, Li, and Peng Wang. 2019. “From Institutional Interaction to Institutional Integration: The National Supervisory Commission and China’s New Anti-Corruption Model.” *The China Quarterly*, 240: 970-971.
- Liao, Xingmiu, and Wen-Hsuan Tsai. 2020. “Strengthening China’s Powerful Commission for Discipline Inspection under Xi Jinping, with a Case Study at County Level.” *The China Journal*, 84: 29-50.
- Pang, Laikwan. 1964. “Mao Tse-tung’s Materialistic Dialectics.” *The China Quarterly*, 19: 3-37.
- Pang, Laikwan. 2016. “Mao’s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Possibilities for the Future.” *Rethinking Marxism*, 28 (1): 108-123.

- Pei, Minxin. 2006. *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 The Limits of Developmental Autocrac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hambaugh, David L. 2008. *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 Adapt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hirk, Susan L. 2018. "China in Xi's 'New Era': The Return to Personalistic Rule." *Journal of Democracy*, 29 (2): 22-36.
- Smith, Ewan. 2018. "The Rule of Law Doctrine of the Politburo." *The China Journal*, 79: 40-61.
- Teiwes, Frederick C. 2002. "Normal Polit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Jonathan Unger, ed., *The Nature of Chinese Politics: From Mao to Jiang*, pp. 239-257. Armonk, N.Y.: M.E. Sharpe.
- Torigian, Joseph. 2018. "Historical Legacies and Leaders' Worldviews: Communist Party History and Xi's Learned (and Unlearned) Lessons." *China Perspectives*, 2018 (1-2): 7-15.
- Tsai, Wen-hsuan, and Wang Zhou. 2019. "Integrated Fragmentation and the Role of Leading Small Groups in Chinese Politics." *The China Journal*, 82: 1-22.
- Tsai, Wen-hsuan, and Xingmiu Liao. 2022. "Fast Track Promotion for Grassroots Cadres: The Xuandiao Sheng System in Xi Jinping's China." *Issues & Studies*, 58 (1): 1-24.
- Tsai, Wen-hsuan. 2015. "The CCP's Neican/Pishi Model: A Unique Pattern of Policy-Making in China's Authoritarian Regime." *Asian Survey*, 55 (6): 1093-1115.
- Tucker, Robert C. 1977. "Personality and Political Leadership."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92 (3): 385-397.
- Wang, Hsin, and Shan-yun Shi. "Comprehensive Law-Based Governance in China? Legislating Authoritarianism in the Xi Jinping Era."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full/10.1080/24761028.2022.2120715?scroll=top&needAccess=true&role=tab> (March 2, 2023).
- Wang, Yu-hua. 2015. *Tying the Autocrat's Hands: The Rise of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Yu, Peter Kien-Hong. 2000.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PLA." *Defense Analysis*, 16 (2): 203-217.
- Yuen, Samson. 2014. "Disciplining the Party: Xi Jinping's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and its Limits." *China Perspectives*, 3: 41-47.